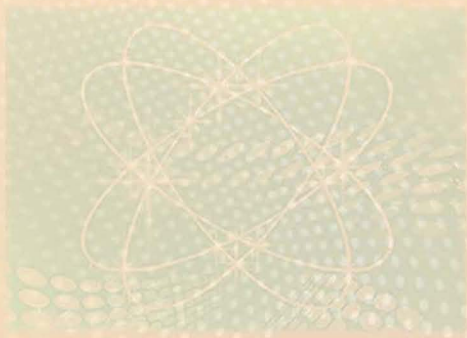


文史风景线

⑮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 (1949—1966)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文史风景线

①⑧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 (1949—1966)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 —修订本.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7. 11

(文史风景线)

ISBN 978-7-5373-1465-7

I. 新... II. 北... III. 文学史—中国—1949~1966—青少年读物

IV. I209.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406 号

文史风景线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 (1949—1966)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32 开

印张:600 字数:9000 千

2007 年 12 月修订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7-5373-1465-7 总定价:2560.00 元(共 1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新时代文学·····	1
文学概述·····	1
《时间开始了》·····	9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14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19
乡土文学·····	24
文学概述·····	24
《山乡巨变》·····	31
《锻炼锻炼》·····	37
《李双双》·····	49
战争文学·····	55
文学概述·····	55
《红日》·····	65
《林海雪原》·····	70

《百合花》	75
历史文学	84
文学概述	84
《三家巷》	92
《茶馆》	97
《红豆》	101
社会文学	107
文学概述	107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19
《望星空》	125
民族文学	131
文学概述	131
《阿诗玛》	140
《正红旗下》	146
《划手周鹿之歌》	150

新时代文学

文学概述

1949年7月,我国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他说这是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的集合。两个地区指的是什么呢?即解放区和前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用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来自这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他是这样说的:

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绝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

在这次文代会上，周扬和茅盾分别做了总结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周扬在刚开始宣读报告的时候，就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这样说道：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按照他的说法，他介绍解放区文艺的经验，理所当然地是作为未来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来推广的。茅盾的报告虽然是总结斗争经验，但更重要的篇幅是用在检讨前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属于人民需要的人，也是受到人民欢迎的人，这本身就体现了崇高的荣誉。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很重要的标志，它预示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也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这样的新的文艺阵容的组合工作，在194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展开来。中共领导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那年策划了文学理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创刊，批判文坛上各种倾向。

在这个刊物上，有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激烈批判沈从

文、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又有邵荃麟、胡绳、乔木等对左翼阵营内的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进行了集中的清算。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另外几家进步刊物也开始配合对国统区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创作进行了有计划的批评，被批评的作家有姚雪垠、骆宾基、钱钟书、臧克家、李广田等，范围可以说是相当广，相对照的是他们对解放区文艺创作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和肯定性的评价。

后来的文学史家认为，1948年的这场批判和再评价运动，正是在为文学史的评价做准备。这场批判运动的结果和目的，可以说就是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是为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虽然意味着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建立，但是并没有宣布阵营内部的思想斗争已经结束。当代文学的两大传统虽然已分清了主次地位，但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美学修养、两种文化实践，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并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文学史通常都由批评与自我批评构成，到1954年和1955年，毛泽东亲自发起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文学理论家胡风及其集团的批判，可以说是这场冲突的顶峰。俞平伯致力于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他的学术成果之所以被挑选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批判运

动的典型,主要是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来自于胡适。

20 世纪 40 年代末,胡适离开大陆远走美国,但他对留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体现在政治立场,更多地体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上。胡适在人生当中,非常强调实用主义,强调重实验和重证据,要求搞研究不能迷信和盲从等等。20 世纪 30 年代,胡适曾用这种思维方法来劝阻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30 年代,胡风从左翼文艺运动中诞生出来,他是左翼文学理论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抗战以来的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

在文学大师鲁迅逝世以后,他自觉继承鲁迅所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实践道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和影响文艺创作实践。他通过编辑《七月》和《希望》等刊物和丛书,团结了很多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在抗战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尽管胡风的思想是先进的,但他的所有文学实践都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他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带有战斗传统,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胡风认为知识分子在接近大众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并在抗战的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他还坚持对蕴涵于大众中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批判,他的这些观点都

体现了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也适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的要求,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生活环境不同,这些差异还不明显。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方针,这些差异非常尖锐地表现出来。胡风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的严重性,他把它看成是来自解放区的理论家在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发生的理论偏差,为了让毛泽东直接理解他的理论观点,他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系统地解释自己的理论主张,并逐条反驳何其芳和林默涵等人对他的批判。

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长达30万字,在发表了这个报告之后,他非但没有获得信任和缓解矛盾,反而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最后升级为政治问题。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最后被强加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并且受到了镇压。20世纪80年代,这个冤案才逐渐平反。经过批判胡适思想和镇压胡风集团,新时代文学的基本内涵已经无法再生出积极的意义,但凡能被毛泽东吸收到自己文艺思想体系去的部分因素,也只能通过毛泽东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别的语言很难表示。

在这个时候,其他因素都转化为隐形状态,零零星星地结

合着作家的创作实践,陆续被表现出来。1956 年的双百方针时期,关于干预生活和提倡写真实的文艺现象中,新时代的精神复活在文学创作方面,这种传统仍然断断续续地发挥着影响。从新时代文学中成长起来的作家,面对新时代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由于 30 多年来的文艺道路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作家,在这个时候都不能不带着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与新时代的关系。

有很多作家已经出奔海外,就是留在中国迎接新政权的作家来说,内心世界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纵情欢呼,有的小心窥视,有的惊惶失措,也有的隐姓埋名。从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比较单纯的革命时代里,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却不是如此。

第一类作家:他们主要来自左翼文学阵营,是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进步民主人士。他们在新政权的奋斗史和建立史上占有非常高尚的地位,胜利者的喜悦极大地支配了他们的情绪,尽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纠葛中,他们也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烦恼,但站在历史与人民的立场上,他们真诚地感受到分享胜利的喜悦。

这类作家与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不同,来自解放区的作家经过延安整风的教育,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新政权对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除了赋予革命的权利以外,还将同时赋予痛苦

地改造自己旧世界观的义务。他们则是在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就以唯我革命的姿态,激励着自己在艰苦的环境里孤军奋斗。指导别人斗争的人往往忘记了自己也会成为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此刻,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新政权看做自己长期追求的理想实现,高声歌唱新政权。

第二类作家:这批作家的数量众多,是游离于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这些作家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状,所以对于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并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了什么。尤其是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多少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们自知与新的时代要求有很大的距离,希望通过互相谅解,达成某种新的契约关系。

新时代的重要作家比较多的是持这种态度,老舍最初从海外回国,提出过不反美的要求;巴金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发言,竟情不自禁地套用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在十月革命后回国参加苏维埃建设时的讲演题目:《我是来学习的》。

第三类作家:那些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地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并不愉快的回忆,或者虽然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的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是格格不入的作家,他们被分为第三类。他们在时代发生深刻变

化的关键时刻,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忘掉过去的不愉快记忆,和新政权重新调整好关系。

在如此崭新的时代面前,他们的内心相当紧张,沈从文就是这类作家。他在那个时候,因为承受不了来自时代的巨大压力,曾经精神失常。在狂人般的呓语里,表达出敏锐的感受。他当时写下的这些文献,都不可能公布,成为潜在形态的写作。在今天看来,却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真实的精神记录文献。沈从文后来终于离开了文学领域,转向历史文物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绩。

这类作家在这个新时代,大多都自觉退出文坛,隐居在民间。有个别人也在潜在的状态下,继续从事着大量的写作,如卜宁在隐居状态下,完成了200万字的巨著《无名书》,他的坚持奋斗的精神是非常崇高的。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非常复杂,作家的主观态度和倾向仅能决定文学创作的某个方面,他们所面对的更具体的文化困境是新时代文学的表现形式。从思想、感情到审美语言,在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失去了呼应时代的能力。除极个别作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创作出较好的作品外,绝大部分前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优势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们的抒情变得空洞无力。

他们的写实变成图解时事,这就使他们的创作不仅数量

下降,而且也失去了生命涌动的魅力。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创作能力的衰竭,而是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当代文化规范不适应,并且不能接受他们的精神劳动。真正体现出新时代精神成果的,是许多在当时不能发表,也没想到要发表的潜在写作。在今天看来,却是那个时代最有特色的文学创作,应该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时间开始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是旧的文化规范不适应新的形势的新旧交替时期。思想理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成为当时的风气,文学创作反而相对寂静。这与时代表面所呈现的轰轰烈烈状况相比,形成了不协调的对照。在这样的气氛下,胜利者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成了高昂的声音。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政治抒情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上,这也是在新时代文学中所没有的因素。大约先是抗战环境促使诗人对灾难中的祖国的颂扬,进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间文艺中,出现了对地方政权和领袖人物的颂扬,艾青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为满足表现新时代的题材与主题的要求,颂歌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在内容上,它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的歌颂;一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这两方面就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颂歌样式成为 20 世纪 50—60 年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主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颂扬达到了登峰造极。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由于颂歌是新的主题样式,“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自由诗体的创始人郭沫若,竟用古典辞赋形式写出了歌颂新政权的《新华颂》,柳亚子等旧体诗唱和也风行一时。用自由诗形式来写颂歌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流于空洞抒情或概念化叙事的粗制滥造倾向也不在少数。

总的说来,可能是诗人积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倾诉,语言上往往表现出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事句比比皆是,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诗歌的规律和节奏,以宏大叙事来重新创造诗歌的巨无霸形式;又反映出诗人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体现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